



张 越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探秘《江格尔》

中国蒙古学文库



中国蒙古学文库

探秘《江格尔》



张 越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张越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秘《江格尔》 / 张越著. —沈阳 :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6.5

(中国蒙古学文库)

ISBN 978-7-5497-1326-4

I. ①探… II. ①张… III. ①蒙古族—英雄史诗—诗
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4496号

探秘《江格尔》

TANMIJIANGGEER

出版发行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13.875

字 数：360千字

插 页：8

印 数：1-1000

出版时间：2016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包满都拉

封面设计：杜 江

责任校对：崔维诚

标准书号：ISBN 978-7-5497-1326-4

定 价：55.00元

法律顾问：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址：www.lnmzcb.com

淘宝网店：<http://lnmz2013.taobao.com>

举报电话：024-23284336

邮购电话：024-23284335

联系电话：024-23284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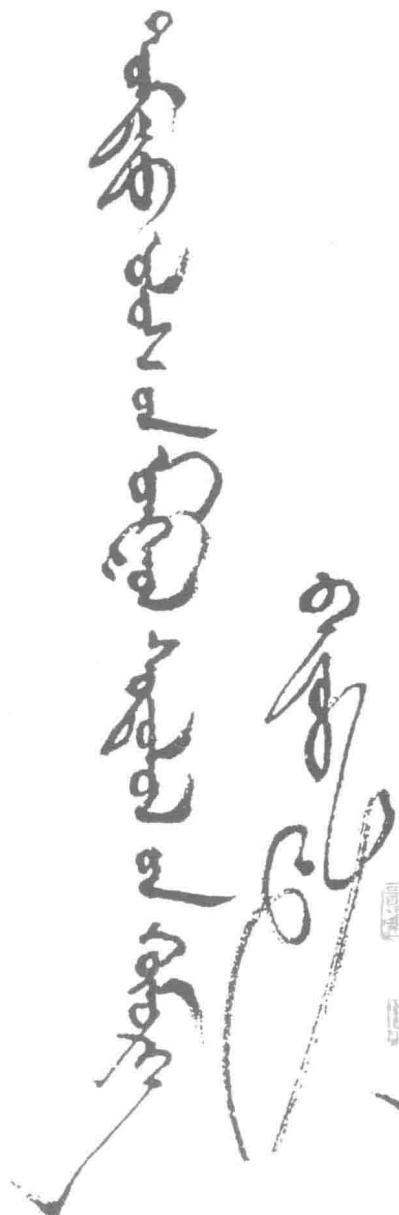
中国蒙古学文库



布赫

卷之三

毛氏家藏之印



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 领导小组与编委会

领导小组 / 巴图巴根 阿拉坦敖其尔 周德海
高万宝扎布 洛布桑 文 精 于永祥
总 编 辑 / 包 祥 格·孟和(常务) 王学俭
援 朝 乌 峰 包·赛吉拉夫 包满都拉
编 委 /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学俭 王 雄 乌 峰 白兰英 包 祥
包 辉 包满都拉 齐木德道尔吉 格·孟和
包·赛吉拉夫 援 朝 额·额尔德木图
色·额尔德木图 额尔敦陶格套

《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总序

《中国蒙古学文库》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文化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繁荣的客观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文库》自筹备到出版以来走过了艰苦立业、敢为人先、追求一流、不断创新的12年。到2009年9月正式出版了百部书，并以此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献礼。同时召开了“百部纪念会”，出版了《百部纪念册》，可以说《文库》编委会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工作。

《文库》是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蒙古学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它的编辑出版开辟了学术著作出版的新途径，成为蒙古学研究成果跨世纪的丰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将成为繁荣发展蒙古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位较高的文化名牌。随着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不断增强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和谐互助关系，为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区的建设，为推进蒙古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突出民族特色，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和社会人才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很有必要继续编辑出版蒙古学方面的学术著作。

为此，《文库》领导小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呈报了《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百部书的申请报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批准了申请报告，决定《中国蒙古

学文库》继续出版。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是自治区学术界的一件喜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文化建设所做的一件实事，是继续推动蒙古学研究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它标志着《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并使我们深刻认识和看到，党和政府情系民生，执政为民，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繁荣文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形象。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彰显了游牧文明的优越性，成为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奇迹，造就了世界新的格局，展示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产生了重大的至今还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充满生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蒙古文化，形成了国际性、综合性的“蒙古学”。“蒙古学”就是以蒙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内容是研究蒙古族形成和发展中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传承和繁荣发展规律，是研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互助和谐、共同进步的过程和经验。

蒙古学是国际性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中国特色。最根本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这是中国蒙古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所在，是我们以往研究和创新所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库》今后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遵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认识和改造蒙古传统文化，如何借鉴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

蒙古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趋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力研究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进而改造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寻求现代化的路标；着力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趋势，探索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着力研究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现实问题，全面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蒙古学是综合性科学，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而全面。《文库》致力于编辑出版蒙古学方面的学术性研究成果。特别注重专题研究、系列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些内容的研究以及编辑出版，是《文库》的中心课题，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势。资料汇编、论文集、辞书、名词术语汇编、回忆录、个人选集或全集、杂记、传记、多卷本著作、文艺小说等不属于《文库》编辑出版范围。

《文库》优先选择以下著作：（1）带有抢救性的著作；（2）学术方面的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的最终成果；（3）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充实修改的著作；（4）新兴学科、薄弱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著作；（5）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著作。先出版用蒙古文或汉文撰写的一种版本，今后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些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具有共同性使用内容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著作，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出版。

出版的著作要有鲜明特色，弘扬创新精神，体现精品意识。一切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挖掘好、研究好、保存好、维护好、发扬好蒙古文化的固有特色，充分彰显蒙古文化的风格和气派。同时积极汲取世界先进文化，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致充分体现蒙古文化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鼓励大胆的创造，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创造性是蒙古文化固有的特点和发

展的内在活力。《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曾指出，成吉思汗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是“凭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的”，“全是他自己领悟的结果，才智的结晶”。

《文库》以原创性、系统性和突破性作为编辑出版的基本要求。突出原创性，就是要求出版创新的、新颖的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注重系统性，就是要求出版学科建设中的系列著作，在某个学科方面具有权威性成果，为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立体系起到奠基性作用的著作。强调突破性，则要求从研究的领域、资料、观点、方法等某一方面超越前人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填补历史空白的著作。

质量是编辑出版的生命。精益求精，精心组织，高标准、严要求，要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保证出书的质量。为此严格执行“编委责任制”、“三审制”，把好“三个关”。书稿由总编根据书稿内容和编委的特长确定该书稿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书稿负责到底。编委会执行“三审制”，由两名专家审稿，编委会集体讨论，总编审阅定稿。出版社也要执行“三审制”，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编委会和出版社共同把好政治思想、学术水平、文字技术三个关。

续版的百部书必须抓住重点，努力做到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思想并举，以主体思想的研究为主；系列研究和体系研究并举，以体系研究为主；历史问题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举，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突出了重点才会显示《文库》的出版特色和优势，开创蒙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蒙古学的研究转入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新阶段。这是在蒙古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是蒙古学研究中出现的实质性飞跃。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至理名言。这里说的

“科学”当然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我们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其目标就是让中国各民族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必须强调理论思维的学习和锻炼。蒙古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始终绵延不绝，这就足以证明，它必然有其优秀传统，有其很多的优点和特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它融合、消化进而变为自己的文化，形成蒙古化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蒙古文化具有独立性，但系统性尚未形成，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很不平衡；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严重滞后。这也足以证明，蒙古文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这里除有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为外，与文化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理论思维的地位和作用，忽略蒙古民族思想史和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忽略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有直接关系，以致严重影响了蒙古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影响了各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体系的历史进程和水平。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是人类文化史研究证明了的普遍真理。理论研究和创新、创体系是一个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民族文化走向成熟、进入文化自觉境界的表征，也是不断深入研究，开拓创新的必然结果。只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各学科创立并逐步完善的体系，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充分彰显民族文化在开放中仍然能够保存和弘扬的优秀成果，突出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使民族文化在有条件的流变中做到有选择地包容外来文化，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充满生机的开放性体系，找到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活力；才能使民族文化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创新，大胆地应用，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文化研究中理论研

究、理论创新、创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层次或阶段。智慧凝聚经验，思想闪耀光辉，理论显现魅力，真理揭示规律。《文库》续版的百部书要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充分利用新世纪赋予的难得的良好机遇，使蒙古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这方面要有新的作为，要有新的建树和创新，以弥补蒙古学研究中的历史性缺憾或薄弱环节。把蒙古学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原版“总论”是由《文库》总编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著名学者、研究员留金锁先生执笔，编委会讨论通过的。“总论”概括地论述了蒙古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叙述了研究蒙古文化的过程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在编辑出版“百部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宣传和指导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续版的百部书中将原版的“总论”和“序”重新修改，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称之为“续版总序”。续版在封面设计、装帧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以崭新的面貌问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将会引起作者和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续版百部书，在组织机构方面取消了《文库》的顾问。对领导小组成员、总编辑和编委成员都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原有的同志多位是离退休的领导、专家、学者。他们参与了《文库》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工作中任劳任怨，淡泊名利，不计报酬，默默耕耘，倾注了一片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的睿智、业绩和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永驻在《文库》的字里行间，记载于蒙古学研究的史册。

在我国，研究蒙古文化由来已久，而且资料文献甚丰，成果累累。但是将蒙古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展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古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推进，著述颇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百花园中

一朵绚丽的奇葩。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的百部书，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将在更高层次上整体推进蒙古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成为反映时代特征、适应实践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蒙古文化。自治区领导的这一决策和编委会的一系列有关的举措，对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建设，促进国际蒙古学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也是深远的。

我们深知，《中国蒙古学文库》是繁荣图书出版事业的创新之举，是传承文明，繁荣学术，继往开来的薪火工程，是功在当代，惠泽后人，流芳百世的宏伟事业。我们要认真总结以往经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再创新的业绩。编委会要以新的姿态，振作精神，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认真审阅，精心修改，力求编辑出版精品力作。我们的工作是艰巨复杂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的。由于我们才智的局限，以及理论基础、学术水平和编辑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缺点，恳请作者和读者及时赐教。

《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3月

努力解读 《江格尔》蕴涵的古文化密码 ——自序

33年前的1982年8月，由自治区《江格尔》领导小组和自治区文联联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首届“江格尔”学术讨论会。作为自治区文联主办的《新疆民族文学》的编者，我去会上组稿，编发了“《江格尔》学术讨论会集锦”一组论文与报道，同时结识了新疆、北京、内蒙古等地研究《江格尔》的学者专家，对史诗有了初步的了解。一年半后，竟收到内蒙古的色·道尔吉先生题名赠寄的，由他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汉文版《江格尔》。这份宝贵的礼物，让我喜欢上了这部神奇瑰丽的英雄史诗。数年后，在一蒙古族朋友的鼓励下，竟阴差阳错地参加了第一届“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及以后多次讨论会，成了研究《江格尔》这部史诗的一员。

然而，对于我这个不懂蒙古语文，不了解蒙古历史文化，也不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真是困难多多，颇费踌躇。为了不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东拼西凑、人云亦云的应景之作，我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江格尔》的汉译文上，从文本出发，作文学研究。

文本研究在民间口头文学研究中似乎不很普遍。就我当时所知，民间文学研究提倡的是田野调查，掌握各种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考据。这是我做不到的。我只能选择文本，而且是汉译本。后来，有人认为我不懂原文，仅凭译文研

究，论述可能有误。但是我想，每一个译者，尽管水平有高低，但能被选中翻译《江格尔》，肯定是比较优秀的；他们总会尽可能准确无误地把原文翻译过来，尤其是史诗的基本故事情节，大概是不会有错的。况且，这些译文是经过校正者、编辑者的订正。既然为把关出版的专业人员认可，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它。我相信译本，并以他们为根据进行研究。

我注意到，许多蒙古族学者的江格尔论文，多是从调查研究整理方面或结合蒙古历史文化哲学民间文学来论述、考证、论证某些问题，很少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即使是谈到江格尔的艺术特色，也是和其他蒙古史诗、民间口头文学混在一起论述，还往往是浅尝辄止，很简略，没有专文。于是我决定从艺术性着手来论《江格尔》，后来，陆续写出了几篇《江格尔艺术论》。

起初，论文全凭色·道尔吉的译本，后来又收到了199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霍尔查译本和自1993年开始新疆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由黑勒、丁师浩、李金花翻译，浩·巴岱校订的汉文全译本（六册）。后两种版本的《江格尔》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调查、记录下来的正在民间流传演唱的唱段。这样，我对《江格尔》的了解逐渐增长，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拓展和深入。

到21世纪初，当我退休后，又有蒙古族朋友约我写《江格尔》方面的文章。接受任务后，我又重新打开久违的三种版本的《江格尔》。此时，我用更充裕的时间和更从容的心态仔细阅读后，似乎有许多新的感受，新的发现，那神奇瑰丽的情节背后似乎隐藏着许多奥秘，闪闪烁烁，深邃幽远，时隐时现。这时我逐渐意识到，仅从艺术特色方面研究《江格尔》是远远不够的，仅从文学方面研究《江格尔》的艺术特色也是有局限的，必须论及《江格尔》所展现的壮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必须运用更具民间文学特色的方法和其他各种方法去解析《江格尔》，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论述史诗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于是我开始阅读，寻找有关《江格尔》民间文学研究方法及民俗学等方面的著述。我的思路逐渐聚焦于“母题研究”方面，感到从母题角度切入来观照史诗《江格尔》，能很好地也能整体地把握《江格尔》反映的历史社会生活内容，并揭示这些生动神奇故事情节里面隐藏的古代蒙古文化的秘密。那时我感到，虽然有人撰文提倡母题研究，却无人用这种方法来整体的研究《江格尔》，我想这正是我可以探索的通道。于是我进一步地学习钻研“母题”理论，并开始构思和撰写《江格尔》母题系列文章。通过写作我感到，从母题入手确是打开史诗《江格尔》古文化奥秘的钥匙。

通过这十几年对《江格尔》三种汉译本反复、对照的阅读和艰难缓慢地写作，使我对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一些问题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

首先，是文本研究的问题。

民间文学的文本，虽然是口头流传中某地某时某一民间艺人某次演唱、讲述的记录，不一定能反映出这一民间文学作品的全貌，但一般的说，它多是比较优秀的也具有代表性的才会被人采集记录刊印（即使是片段，不完整，也总会有它某方面的优长之处，有它存在的某种价值）。一旦刊印，就为更广大的读者群众也为后人提供了解和欣赏这一作品的文本。只有这固定下来的文本，才便于人们去研究它。

传统的文学研究最看重的就是文本，然而要正确地理解文本、把握文本的本来意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全面而仔细地、多视角多层次地反复推敲琢磨其故事的情境、情节、细节才能做到。这种态度与做法，不应该仅仅是对作家文学的解读而言，对民间文学创作也应如此，不应例外。

通过对《江格尔》三种文本的研读，我发现，要把握史诗的内容，仅看到那些生动浪漫神奇诡异的情节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情节故事只是史诗的表层结构，表面含义，要探寻其深刻的内

涵、情节故事的深切含义，就必须破解其深层结构、深藏的密码，让潜藏的秘密由隐性变成显性，由深藏不露变成显而易见。

而破解深藏密码的钥匙在哪儿？在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意识到，就在史诗各唱段中经常出现、反复出现的情节、细节中，即母题中。母题研究的开放性使它能够吸纳、包容、统摄文学、诗学、语言学、文化学、美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各种研究方法，全方位地解析文本的深层隐秘，使其豁然开启暴露。

在构思写作母题论下的各篇文章中，我通过对一个个母题的归类解析，将《江格尔》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生产征战，婚姻生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变异的轨迹都一一地剥露、还原出来，显示出史诗《江格尔》博大厚重、丰富精彩的本来面目。

其次，如何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

作为一个汉族读者，要能深度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不能仅凭自己的理解、经验与好恶作为判断高下是非的标准，尤其是对过去时代的口头文学创作，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仅是不尊重兄弟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和创作成果，而且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误读误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学的语境中加以分析解读，遵从他们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才能正确地理解其文本的本来意义，真正读懂读通其作品。

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撰写《江格尔》母题论和部分艺术论时，总要花很多时间去寻找和阅读蒙古族有关的历史、宗教、民俗著述及各种民间文学创作，以丰富深化自己对蒙古文化的了解，并以这些知识和认识去发现、提取、概括、解析《江格尔》文本中有关方面的问题，让我的文章达到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论人所未论之目标。即使别人已谈论过，我的文章也会因完全从《江格尔》各唱段文本中的论据出发，更翔实贴切，达到与之互